

颜廷亮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文学

与

黄世仲



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

颜廷亮 著

（工益生社

乙 三

颜廷亮

2001.1.6. 2.m'

甘肃人民出版社

FF74/0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颜廷亮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9
ISBN 7-226-02284-2

I . 黄 … II . 颜 … III . 黄世仲 - 人物研究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033 号

责任编辑:李德奇

封面设计:徐晋林

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

颜廷亮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9 千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6-02284-2/K·378 定价:18.00 元

序　　一

颜廷亮教授寄来他的《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一书书稿，要我为其写篇序言。黄世仲是我的外祖父，颜教授这本书是他多年所写有关黄世仲的论文自选集，我自然为颜教授这本书的出版而感到高兴，也当然愿意遵命为之写序。

最近若干年来，我遵照母亲生前的嘱咐，为筹建外祖父事迹陈列馆、搜集和编印有关外祖父的各种资料、组织有关外祖父的研究工作等等，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得知在祖国大西北的兰州，有一位颜廷亮教授，从几十年前起就一直在研究外祖父黄世仲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发表了许多写得相当好的有关论文。我不认识颜教授，也不知道远在兰州的颜教授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地研究黄世仲。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却对我做好一系列有关外祖父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同时也使我很想结识颜教授。

1998年1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许翼心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是颜教授应邀到广州出席“黄世仲历史评价座谈会”。得知这一消息，我当然很高兴，便专程由香港到广州。这样，我才与颜教授相识。当时，我曾问颜教授为什么会热心于黄世仲研究。颜教授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很平静地说：“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得到了一本30年代上海一家书店出版的《洪秀全演义》上册。拜读之后，对黄世仲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于是，便开始了研究工作，并由此而扩展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小说、近代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事务冗杂，没有写出多少像样的东西。”我当时想，颜教授所说的“偶然”背后，必定有其“必然”。看来，他当初对中国近代小说、近代文学必定有一定的研究。不然的话，

是不会有“偶然”的。只是，颜教授不是那种好张扬自己的人，不愿讲而已。由此，我也深感颜教授是一位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学者，令人敬佩。

这一次，他带来了他多年搜集到的大量有关黄世仲的资料中的许多件，带来了他多年来发表的有关黄世仲的论文中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供当时刚刚落成的黄世仲事迹陈列馆布展时参考。他带来的全部资料中，有一件特别令人感到高兴，这就是他请国外朋友从英国复印回来的、国内可能已无藏本的长篇小说《镜中影》。现在，经许翼心等先生联系，该书已由颜教授及其夫人赵淑妍女士加以校点，并已由香港一家出版社排出校样，想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另外，他带来的几篇论文，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和颜教授之间的书信、电话联系便多了起来，相互间建立起了友谊。等到去年5月黄世仲事迹陈列馆布展完成并举行开馆典礼时，我专门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到广州出席开馆典礼。这样，我们便又一次在广州相会了。当时，我忙于开馆典礼的诸多事务，一直未能与之详谈。一直到最后，才找到了一点时间。他告诉我，他想写一部《黄世仲评传》。并且说，这部《黄世仲评传》也许是她此生要写的最后一本书，因而要争取写得尽可能好一些。我对他说：“这是好事，我支持你。你们搞学问的，也真不容易。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就是了。”

后来，他从兰州写信给我，说是为写《黄世仲评传》，拟把已经发表的论文和虽已写好而还未及送出发表的文稿选编为一册出版，然后着手进行《黄世仲评传》的写作。再后，他便把《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的书稿寄给我，要我写序。我拜读了书稿，深深感到颜教授的黄世仲研究确实不同一般。他并不只是拾取他人的成果，而是非常重视原始资料的搜求和从原始资料中探究出新结论，而且视野开阔，开掘很深。他纠正了前人许多不妥

当的说法，涉及了许多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特别是《黄世仲著述系年》，不仅著录了诸如《朝鲜血》、《宦海冤魂》、《十日建国志》等多种前人未曾提及的黄世仲小说，而且还著录了许多从来无人提及的黄世仲的政论、杂著，很有价值。还可以看到，颜教授在学术上是十分严谨并勇于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结论的。《关于黄世仲生平的笔者考误辨正》就是一例。在这篇文章中，他纠正了自己在黄世仲之死问题上先前的一个错误看法，并首次考证出黄世仲被胡汉民杀害的具体时间是1912年的5月3日。总之，颜教授的这本《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确实是一本在黄世仲研究中很有分量、很有价值的著作。这也是我愿意为之写序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的外祖父黄世仲是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位斗士，在当年的革命实际工作、宣传工作上很有建树，在革命文学特别是革命小说创作方面更有贡献。遗憾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研究者甚少，致使其功绩湮而不彰。去年，有位方志强先生写成了一部《黄世仲大传》，在黄世仲研究中做出了贡献。现在，颜教授的这本书又要出版了，这当然是黄世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小说、近代文学研究中的又一件大事。我还相信，颜教授正在写作的《黄世仲评传》一旦出版，也将成为黄世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小说、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研究也必会有积极的作用。

谨序。

黄世仲研究基金会主席 陈 坚

2000年6月20日于香港

序二

1999年5月16日，黄世仲纪念馆在其故乡广州市芳村区西塱乡隆重开馆，中央与各省市四百名贵宾济济一堂，对黄世仲的文学造诣与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同年8月18日，在香港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都确认了黄世仲是近百年来香港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者。然而，比诸李伯元、吴趼人等晚清小说家艺术成就的研究，黄世仲研究落后了几乎半个世纪。其原因是，黄世仲被陈炯明借胡汉民之手杀害后，其故居复被强盗打劫，陷于家破人亡的惨境，故其遗作存世者甚为鲜少。再者，省港两地历经日寇侵华与“文革”十年两次浩劫，古籍毁于兵燹者不计其数，香港公私图书馆所藏典籍被日寇劫运赴日者多数未予归还，故资料的匮乏阻碍了黄世仲研究的顺利开展。

当我们今日坐在宽敞明亮、设有缩微胶卷阅读机和恒温空调书库的图书馆从事学术研究时，很难体验九十多年前黄世仲、黄伯耀弟兄夙兴夜寐奔走革命时的生存环境多么简陋窳劣。当时官立学府的图书馆设施犹如凤毛麟角，私人藏书楼只搜藏线装善本书，而黄世仲著作尽皆刊载于发行量有限的报刊，单行本即使有，也均为简装本，并非公私图书馆的收藏目标，以至于今日有心人研究黄世仲著作时，甚至要辗转托人到迢迢万里之外的大英博物馆去复印黄世仲的某些作品和有关资料；分散于国内各省市图书馆的少量载有黄世仲作品的清末报刊，不幸由于学术领域壁垒森严，各自为政，互相保密，致使文学史资料的交流与整理一波三折，难度极大，有志于黄世仲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专家学者

风雨消磨，历尽艰辛。于是，在众多黄世仲研究论文中，搬字过纸搜章摘句者占了多半，有些错误资料屡经抄袭，以讹传讹，居然登上了文学辞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颜廷亮教授是个谦厚君子，他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坚持以原始资料探索学术真理。他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硕果累累，饮誉四方。出于兴趣，他又从事清末文学研究，尤其是黄世仲研究。他从断篇残简中刮垢磨光，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然后引经据典，旁征博考，写下了一系列有关黄世仲的论文，先后发表于国内外学术丛刊与学报。如今，他从中选出十六篇并加以增订，结集成这部20万言的《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这部论文集同方志强先生编著的《黄世仲大传》和陈桢理先生督印的《中外小说林》重刊本，都是世纪之交令人鼓舞的文坛大事。

这16篇论文，包括黄世仲生平考证、黄世仲小传、黄世仲小说理论、黄世仲问题漫谈和短论、黄世仲名篇专论和作品系年以及作品钩沉，无一不是体大思精，脉络分明。

《黄世仲作品系年》和《黄世仲研究论著资料选目》是本书最有学术价值的篇章。颜教授探赜索隐，盘根究底，考证并著录了黄世仲的十多种小说及其以多个笔名发表于清季《少年报》等报刊上的政论文章、笑话、粤讴、班本、谐文、二簧、扬州调、故事、河调、采风录等近百篇篇目，以及本世纪内散见于中外报刊的黄世仲研究论著选目共318篇，此举填补了黄世仲研究的一大空白。事实上，迄今为止的黄世仲研究局限于黄世仲16种小说中的10种今存本，其中有的还是残本；能够皓首穷经，殚思竭虑搜求清末报刊，独辟蹊径者，为数极少也。期盼由此衍生出《黄世仲政论集》的编印，使颜教授的研究成果开枝散叶。

本书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原作钩沉校点。其一是4万字的《辨康有为政见书》，由颜教授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版本精心校点；其

二是 8000 字的文言小说《宦海冤魂》校点本，这是该小说 94 年来首次重印，为黄世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久闻颜教授博学多才。我与他相识于广州黄世仲纪念馆开馆典礼，当时深感高兴。如今拜读他这本书的书稿，看到他为了追求学术真理，一再不辞劳苦地修订往昔的研究结论，从而使其论文近乎炉火纯青，文从字顺，环环相扣，涓涓不漏，窃以为在黄世仲研究中的确堪称一大支柱。颜教授栽种了一棵枝叶繁盛的大树，后学者一定会受用不浅的。

谨序。

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 胡志伟
1999 年 12 月 30 日于香港

目 录

序 一	陈 坚(1)
序 二	胡志伟(4)
关于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的几个问题	(1)
俄国文学和近代中国的文学探索	(23)
晚清革命派和我国小说理论的近代化	(34)
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小辨	(41)
关于黄世仲生平之笔者考误辨正	(54)
黄世仲小传	(62)
黄世仲作品诸问题小辨	(66)
黄世仲作品系年	(85)
黄世仲作品系年补遗	(105)
黄世仲、黄伯耀的小说理论	(115)
短论三题	(127)
晚清革命派没有办过小说刊物吗?	
黄世仲《〈辩康有为政见书〉弁言》	
章太炎的《洪秀全演义序》	
《镜中影》小议	(132)

辨康有为政见书(校点本).....	(139)
宦海冤魂(校点本)	(190)
黄世仲研究漫议四题	(200)
黄世仲研究论著资料选目.....	(222)
后记	(264)

关于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学的近代时期，从 1840 年开始，持续了大约 80 年的时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学却呈现出了与前此的文学明显不同的面貌。这是一个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国文学经历了一个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近代色彩的文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总结并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建设今天的新文学，无疑是重要的意义的。

当我们着手分析我国文学近代化过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应当先搞清楚的，这就是我国近代文学的性质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所谓近代文学，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学。它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经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直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从产生、发展以至衰落，一直延续了数世纪之久。这种文学，或者表现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并按照自身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要求和愿望，或者表现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弊端不可避免的出现、危机不断加深时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辩护。

我国近代文学的性质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不同于世界上那些按照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发展的国家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人类历史已经进入近代时期许久许久了，中国社会还停留在封建统治阶段；而当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已经出现、中国社会将要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却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将要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过程被打断，而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半封建半

殖民地化的道路。因此，中国的近代文学，其性质也就必然不同于欧、美、日本等国的近代文学。

首先，中国的近代文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文学。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之役，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之战，等等，一次比一次更大程度地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一次比一次更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一次比一次更大程度地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强烈的反响。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张维屏、朱琦和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的民间作家们起，经过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林旭，到秋瑾、邹容、章太炎、陈天华、柳亚子、苏曼殊、宁调元、黄世仲，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都留下了反帝爱国的不朽篇章。这种反帝爱国的篇章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怒和抗议，揭发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中国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歌颂了抗敌御侮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抒发了中国人民对于祖国独立富强的热烈向往。它们带有鲜明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印记，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一曲又一曲时代的最强音。这样的作品，在前此的中国文学史上固未有过，在欧、美、日本等国的近代文学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其次，中国近代文学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中国封建社会在进入近代时期之前，本来已经呈现出大厦将倾的形势。在帝国主义用炮火轰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先是屈膝投降，后又与侵略者狼狈为奸，从而更加暴露出它的反动和腐朽。于是，在文学上也就产生了越来越壮阔、越来越有力的反封建、争民主的潮流。近代时期一开始，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和民间作者们，就已经通过创作，表达对清朝政府的不满和期望改革的心愿。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这种反封建的倾向在文学上又有发展，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的诗文以及天地会的《三点革命诗》等等，都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朝政

府。等到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并走上政治舞台之后，这种反封建的文学作品还越来越多地带有了新的色彩，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鲁迅曾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扶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①鲁迅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举凡官场的腐败、封建迷信、封建伦理道德，等等，无不受到批判。然而，鲁迅的论述犹有未足，他不仅未及诗文（这不是缺点，因他这段话本来是只论小说的），而且未及谴责小说以外的小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中，民主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张肇桐的《自由结婚》、陈天华的《狮子吼》、汉国厌世者的《洗耻记》、怀仁的《卢骚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和《大马扁》等等，在对清朝政府以及改良派进行批判的同时，都热烈地希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出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诗文，情况也大致相同。中国近代文学中的这种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作品，在前此的中国文学中也是未曾有过的，在欧、美、日本等国的近代文学中则仅见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

自然，近代时期的中国文学中，也有不少反动落后的作品。比如，俞仲华的《荡寇志》，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花月痕》、《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等侠邪小说，曾国藩之流的古文，都曾经起过反历史潮流的作用。然而，这类作品毕竟不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就主流而言，无论其作者是封建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民间作者，其作品都贯穿着反帝爱国的精神或反封建求民主的精神或两种精神的融合。反帝反封建

和爱国民主——这就是近代时期中国文学的性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就是这种性质的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在搞清了近代时期我国文学的性质，即我国文学近代化的方向之后，就可以看到，我国文学的近代化始自鸦片战争时期及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文学的近代化经历了前后两个紧相连接的发展阶段；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文学的近代化在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入了停滞阶段，而我国文学的新发展过程，即现代化过程，已经开始酝酿。

一、我国文学近代化的开始阶段

还在鸦片战争前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文学已经有了变化的迹象，出现了具有一定程度反封建精神和民主思想的《镜花缘》。龚自珍、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也已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文学主张，创作了有一定新意的诗文作品。

鸦片战争震醒了中国文学界。于是反帝爱国的作品出现了，对在外敌侵略面前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表示不满和希望清朝政府有所变革的作品也出现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林则徐、魏源、张维屏等的诗篇，三元里抗英群众的揭帖和民歌，就是明证。至于其后出现的太平天国文学，其反帝反封建和爱国民主的性质，也是众所周知的。到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出现时，文学上的反帝反封建和民主爱国，就初步地带有了资产阶级色彩。冯桂芬、王韬等人的文学主张和诗文作品更是具有资产阶级色彩。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清楚地把这一层告诉了我们。冯、王等人之外，黄遵宪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也属同类。

当然，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之战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文学的近代化还是初步的，反帝反封建和爱国民主的文学虽然已经产生，后来还带有了资产阶级色彩，但是，这种文学在当时的整

个文坛上还未占有突出的地位。反帝爱国还比较坚决，反封建争民主则不十分有力，更未触及要害。各种文学体裁的变革尚无十分引人注目之处，文学上以诗文为正宗和以小说戏曲为末流的原有的内部结构尚未打破；封建的传统文学依然颇有势力，在小说戏曲领域中尤其如此。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社会近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的时候由外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当时并未给予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以有力的冲击；后来，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了，但是不仅尚未壮大，而且与封建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不可能向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多大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虽然开始了，但是我们却未能看到和不能指望有重大的进展。重大的进展，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发生的。

二、中国文学近代化的第一发展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中，偌大中国被比自己小得多的日本打败，在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比起鸦片战争来还要大。中国资产阶级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发出过改革的呼唤；此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既已有所壮大，又看到了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强大的事实，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一运动失败后，他们又继续在思想战线上作战，力图经由“新民”而实现其改良目标。直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阶段才成为过去。

在这个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从兴起 to 失败的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我国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传统文学的受到猛烈批判；文学改革口号的全面提出和文学改革理论的有力阐述；文学改革实践的颇有成效的进行：这一切都使中国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其结果则是与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紧密联系的文学创作的空前兴盛。

甲午战争之前，思想界曾经出现过推崇新学而否定文学的思潮。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种思潮更为发展。^②然而这种表面上“否定文学”的思潮，其实并未否定一切文学，而是对封建传统文学的否定。因为，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者，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在推崇新学和否定文学的同时，却还是在写诗为文。甚至被有的同志引来证明这些人否定一切文学的言论中，有一些也透露出他们其实并非否定一切文学，而只是否定封建传统文学。如梁启超所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丽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③之类就是如此。

他们一方面否定封建的传统文学，另一方面则提出文学改革理论，进行文学改革尝试，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需要，即配合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在诗歌方面，黄遵宪主张“别创诗界”、写“新派诗”^④。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则有所谓“新学之诗”的试验^⑤，虽然他们的多数诗作，以新典代旧典，即生吞活剥地搬弄儒、佛、耶三教用语以入诗，搞得隐晦生涩，难以索解，“好像徒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⑥，但他们毕竟是在探索新的诗歌道路。在小说方面，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的小说观念已大大不同于先前。在欧、美、日本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开始给小说以重要地位。康有为1897年编成的《日本书目志》，将小说与政治、法律等十四门并列。梁启超同一年提出用“说部书”作为蒙学读物之一的主张^⑦；之后不久，又指出“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阅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⑧。严复和夏曾佑更进一步指出，由于“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故附印“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之说部于《国闻报》，以便